

## 第九章 文化精进 催生社会进化

全球性竞争意味着世界不能再回到牛耕农业社会那样绝对专制、等级森严、自给自足的时代，也不能再回到装配线工业社会那样唯命是从、官僚主义、统一样式的时代。当前所掀起的技术经济社会变革的第四次浪潮，带给我们的，不单有经济与科学技术的飞跃，更涉及到文化、体制的变迁。鉴于此，未来学家托夫勒大声疾呼：“人类不止在过渡，而且在转型；我们要面对的不仅是一个新社会，而是一个崭新文明的再创造。”文化已经成为社会发展的耦合器。中国社会的转型，多元复合特征越发显著，而无论城市化、市场化、知识化、扁平化、开放化、创新化抑或生态化，其顺利实现都需要探寻和激发社会更广范围内深层次的文化动力，因此社会的转型必然落脚于文化更新。传统的文化心理、思维定势、价值取向及行为方式倘若得不到根本改变，转型就有可能永无尽头，现代化社会也必然无法真正形成。

### 第一节 现代文明的流变

回溯历史的轨迹，各国在近乎不经意间经历着兴与衰。“不经意的”是“时间”，但“兴与衰”的变化早已引起现代人的思索。科学的探求精神，越来越有力地批判着我们以往在探讨西方崛起时回避思想自由，文化变革的重要作用的片面做法，而近400年的国际国内的历史经验，呈现出的结论则是：仅有技术层面的先进，不可能全面推动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保持民族自立状态而不陨落；同样，仅从技术层面来解释一个国家的崛起，当然不足以服人，至少不能完全服人。

## 一、欧洲国家的开拓探索

有这样一种观点：“1000年前的欧洲拥有世界主导地位的可能性几乎等于零，500年后欧洲却完全有可能主宰世界。”从今天向前推500年，上述观点无疑在突出地理大发现对欧洲崛起的作用，但事实上，在这之前，“其他社会已经落后于欧洲了！”

### （一）劳动分工和市场扩大促进了技术创新

水车、眼镜、机械钟、印刷术、火药功不可没。一是水车。10世纪和11世纪，水车得以复兴，在雨水充足和水流普遍的地区，水车的应用成倍增加。公元1086年的“英格兰土地勘察记录”标明，在英格兰这个欧洲外围的落后岛屿上，共有5600部水车；而在欧洲大陆上，水车的数量就更多了。水力运用技术的提高则更为显著。机械师通过建设堤坝、池塘等方式提高水压和效率，将水车排成一列，利用逐步减少的水能完成各项不同的任务。同时，附属设备（曲柄、齿轮等）的改进或发明，使得利用远处的能量、更改方向、变旋转运动为往复运动成为可能，并应用于更多的新工作中，如谷粒粉碎、布匹蒸洗、金属制造等等。二是眼镜。对于眼镜，现代人是再熟悉不过了，然而，在眼镜发明之时，它的意义可谓异常深远。它使得技术工匠，特别是从事精细工作的人，如抄写者和读书人、工具仪表生产者、精细织布工、金属制造工等的劳动生涯延长了一倍以上。于是，精细工具的发明受到空前的鼓励，它们直接为组合机械提供了适合的零件，更在不远的“将来”把欧洲推向了别处所不知的奇妙境地。三是机械钟。这件小小的器物，不仅是“天朝”中国接触欧洲现代文明的重要媒介，更为欧洲带来了观念上的革命。随着城市的增长与扩张，中世纪的欧洲出现了多种时间信号，造成了若干混乱与冲突，社会需要一种更可靠的时间衡量仪器，这便是机械钟发明的背景。机械钟从发明到其制造和设计技术的提高，一直承受着无情的压力，因为，趋于损害教会的权威，并要接受地球和太阳严格标准的检验。最终，机械钟带来了集体与个人的秩序。机械钟的公开显示和私人所有

奠定了掌握时间上的自治的基础：人们不需要来自上峰的命令，可以自行协调计划与安排，并由此促进了生产效率的提高。四是印刷术。尽管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在中国，但它在知识保存和传播方面所发挥的积极作用，远未像在欧洲那般“爆炸”。中世纪时，欧洲社会对书面文字的兴趣迅速增加，特别是官僚体系和城镇的兴起，促使记录、文件的需求剧增。结果，抄写再也无法满足社会要求，加之四分五裂的政治权威使得欧洲没能出现如穆斯林国家等的阻止新技术应用的强大力量，于是，活字印刷术由莱茵河流域流行至整个欧洲，促使大量的书面作品为人们提供精神动力。最后谈谈火药。推崇实用的欧洲人，自13世纪末（或14世纪初）由中国得到火药之时，便意识到了这一技术破坏性的比喻意义或修辞幻想具有对敌人极大的震撼力。他们将粉状火药改良为小颗粒状或卵石片状，大大提高了火药爆炸的速度、威力和充分程度。这一成果对日后欧洲征服世界可谓意义重大。

## （二）政治上的分离导致竞争和革新氛围的形成

中世纪，专制同样盛行于欧洲，但是，法律、领土瓜分和国内中央领主（王室）与地方领主的权力分配缓和了专制控制的程度。分裂导致竞争，竞争则促使君主更好地关心其臣民。与统一的帝国相反，在分裂的环境中，如果君主对臣民不友好，臣民就有可能迁移至他国。欧洲各地社会的权力纷争引起半自治城市（其组织形式称为Commune）这一特有现象的出现。这些城市非但在市场方面具有相当大的重要性，更鉴于其本身独特的民事权力——赋予居民以社会地位和政治权利，从而发挥着行政中心的作用。

除了上述的国家政权分裂，尘世与宗教的分离也推动了竞争和革新。基督教渴望帝国宽容，很早便将上帝和凯撒区分开来，各得其所；但双重的最高权威最不稳定，易导致误解和冲突的产生。于是，教会屈服了，不仅将属于凯撒的予以归还，还让出相当部分的原属上帝的权利；其中包括放弃了大一统的正统地位，这样，权威分立导致异议纷纷出现，最有利于鼓励精神活跃和公众发挥首创性。

另外，教会成为知识的管理者和技师的重要训练所。尽管教会最

初被认为只专注于祈祷与冥想、对技术无甚兴趣，但将神职人员从耗时费力的世俗事务中解脱出来的愿望导致了动力机械的引进和广泛使用，而且从西多会修士开始，还雇用世俗人员（平信徒）担负杂役，这种雇佣关系客观上鼓励了对时间和劳动生产率的关注。

### （三）地理大发现促成欧洲向资本主义社会的飞跃

地理大发现，是对15~17世纪欧洲航海者开辟新航路和“发现”新大陆的通称，它是地理学发展史中的重大事件。从最初葡萄牙的亨利亲王组织对非洲西岸的探险活动，到迪亚士发现好望角、达迦马开辟印度新航线，再到西班牙的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麦哲伦环球航行，以及荷兰的巴伦支、英国的哈得逊。这一系列行动，不仅为欧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黄金与劳工，更对长期禁锢于民众的传统思想以最为沉重的一击。

具体来看，地理大发现对欧洲的社会经济影响深刻，引起了所谓的“商业革命”与“价格革命”，世界市场得以形成和扩大，商路中心从地中海一带转移到大西洋沿岸；欧洲的阶级关系也发生变化，新兴资产阶级加速致富。地理大发现为欧洲的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自由、开放的思想广泛传播，资产阶级正逐渐积蓄力量登上政治舞台。地理大发现还引发了欧洲近代几个世纪的大规模海外扩张，开始了欧洲对世界征服的历史。

## 二、日本的好学与思变

早在1543年，第一批欧洲人就因遭遇风暴的袭击而踏上了日本的国土。尽管他们见到了令人向往的黄金遍地的景象，但这个面积不大的国度却事实上处于分裂的状态，总体上它如同中国一般，人民处于皇帝的统治之下，而各藩的领主才是真正对其臣属享有绝对权力的实体，且他们之间总是进行着断断续续的战争。

不过，对于天性崇拜武力的欧洲人来说，日本赢得了他们的赞赏。因为，与其他的亚洲国家相比，日本拥有更为独特且显著的民族特性，尤其与其邻国——中国相比，两者相去甚远。与导致中国民众

成为专制暴政牺牲品的那种温顺、驯良、循规蹈矩的性格不同，日本民族精力充沛，有着强烈的独立精神和荣誉感。虽然欧洲人的外表曾使日本人惊讶，但很快，欧洲人的洋枪就赢得了日本人的无比的好奇与赞叹，日本人开始意识到世界的广阔，并越来越渴望了解海的遥远一边的另一番天地中的文明。他们首先坚持那是一种完全不同于孔夫子温和的儒家思想的文明，甚至趋向于相信那种文明更能够产生实际的效用。于是，受无止境需求的驱使，日本人最先向葡萄牙人学习，张开双臂欢迎远道而来的“客人”，窥探他们的秘密，试着与他们开展贸易。

日本人的好学源于其持续扩张的野心和欲望。在日本的神话传说中，他们的统治者是太阳神的后裔，自己则是精选出来的优等民族。<sup>①</sup> 长期以来，他们在文化上依附于邻邦中国，是学生而不是先生，是获取而不是给予。这在他们的文字符号、书写工具、家具风格、甚至道德信仰方面都一览无余。但日本人从来不因此而认为自己低人一等，相反，他们还以勤于向人学习的品质而自豪和骄傲。

同样，当他们遇到了欧洲人，他们又积极地学习欧洲人的先进文明，不仅复制武器、仿造钟表，更有许多人皈依基督教。而即便如此，日本人仍旧充满着强烈的自我优越感。

在繁忙、运动和变化的社会之中，知识是禁锢不了的。但是，当局的竭力限制和控制，还是使得日本民众借助于好学而通向富国之路的愿望无法实现。“穷则思变”，日本的精英酝酿并实施了一场社会变革——明治维新，从而使得日本这个唯一的非西方国家在那时搭上了工业化的列车。明治维新的重要意义在于：推翻了腐朽的幕府、取消了封建制度、废藩置县，逐步扫除了深化开放、学习与进取的障碍，并利用先前的准备——治理有效的传统、民众的高识字率、紧密的家庭结构、强烈的职业道德与自律、共同的民族同一感与优越感，去着手构筑有利于实行工业化的体制。其中的核心所在是：日本人知

<sup>①</sup> [美]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97页。

道自己的优越性，且正因为了解这一点，他们才能够认识到他人的优越性；尽管到后来，日本伴随着工业化而迸发出的过分严峻与强烈的民族主义，使得世人对其快速发展之评价有所降低。

### 三、天朝帝国的停滞与衰退

与欧洲的探索和日本的学习不同，中国面对近代化的世界走的却是另外一条道路，自我断绝于世界文明进程之外。

16世纪，当欧洲人越过印度洋进入中国，他们受到了中国人居高临下的恩赐般的接待，尽管他们极不习惯并深受震动。而当时的中国人，不只是居于封建体系最高等级的皇帝，国民都普遍地认为自己居于世界的中央，自己的光辉普照周边，万国来朝。整个国家的如此状况，归根结底源自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以及狭隘的自上而下的专制，由此，导致“天朝帝国”呈现出“不图改进、怠于学习”的消极特征。

改进，就会对人们已经感到自在的传统观念提出挑战，必然引起不服从。引进知识和思想同样也会造成上述结果<sup>①</sup>。再加上自己的傲慢、封闭和愚昧，那时的中国国民更急于拒绝接受外国的一切东西，尽管若干的西方技术仅“拿来”就可为这古老的国度带来巨大收益。

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进入中国的葡萄牙人和天主教传教士，却恰恰利用西方技术的成果——机械钟，打通了他们进入中国的道路。机械钟作为13世纪欧洲人一项伟大的发明，不仅对纪律约束和生产率提高做出了贡献，而且还为人们留下了改进的余地，尤其对仪器生产与操作的发展产生了巨大推动。于是，虽然当时的中国民众仍然对西方人充满戒心，但不得不因为如此美妙的器物而客观地接受这些外族人的登门造访，当然，大部分国人仍显示出强烈的排斥抑或警惕，认为本民族的道德优越感正在遭受攻击、国民自尊心正在遭受打击。

<sup>①</sup> [美]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74页。

天朝帝国，在对西方技术冷漠的同时，也普遍表现出对欧洲人带来的现代科学的抵制，包括知识（有时已是普适的知识）和观念。不过，这种只在探求方面的排外症状并没有表现在所有的中国人身上。少数有远见的官员甚至是皇帝开始觉悟：学习新事物无疑能够使帝国受益。这些人原本可以成为中国现代化的推动者，但却受挫，不仅源于他们地位脆弱、无保障，更源于宫廷环境进而散播于全社会中的“阴谋诡计”。在这种环境中，评判革新的是非功过是以它们对社会等级制度造成的后果为标准的，当然，没有一项建议不招致反对，没有一个新颖的事物不使得既得利益者胆战心惊。同时，除此之外的各位官员，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心理始终占据着上风<sup>①</sup>。

就这样，天朝帝国只靠着往昔的成就慢慢行进，而且随着才华屈从于身份地位，越走越慢<sup>②</sup>。

## 第二节 基于未来的中国传统文化剖析

国家的贫富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文化、政治以经济为基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而文化反应则往往滞后。文化对经济的作用一般是“制约——适应——制约”的；国家贫富受制于经济结构的调整、管理水平的提高，更取决于深层次的文化因素<sup>③</sup>，且文化的影响（包括积极与消极）将异常持续与深远。

### 一、诠释文化新义

透过历史的广角镜，我们会发现，对“文化”的诠释如同人类的历史一般丰富多彩。早期的人类学家将一切烙有人类文明印记的事与物都称之为“文化”，这也就是说，一根竹竿或木棍不是文化，但

① [美]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80页。

② [美]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481页。

③ [美] 戴维·S·兰德斯：《国富国穷》，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第575页。

当它被用做工具为人类服务时，它就成为了文化。因此，文化被赋予了极其宽泛的内涵与外延。克利福特·格尔茨认为，“文化是指一个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包括价值观、习俗、象征、制度以及人际关系”<sup>①</sup>；奥尔兰多·帕特森则认为，“文化是指社会老一代人传播的和同代人之内产生的关于怎样生活和怎样判断的全套观念”<sup>②</sup>；另一些学者则将一个社会或地区的知识、音乐、艺术和文学作品的集合定义为文化。

尽管不同时代的人们对文化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大都在文化所具有的下述特征上保持一致。包括：文化需要通过影响或学习获得；文化不断提醒人们去关注和思考——何种思想和行为方式对人们有利；有时，文化对人们的行为选择具有强制性作用；文化一旦形成就具有一定的惯性，从而对人们思想和行为的影响持续和长远；文化的变革可能来自于外来冲击、社会领袖人物倡导，但更多地是受社会富人阶层和权力阶层的真实思想与行为的引导。

## 二、文化的基本属性与功能

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它伴随着民族的发展而日渐丰富。尽管文化是社会生产、生活和思维方式的产物，但是，一旦它凝固化成为模式，反而会对周围环境（包括组成社会的人和社会本身）产生巨大影响。这些影响正是文化的属性与功能的具体体现。

文化的基本属性有二：综合性与继承发展性。一方面，文化作为人们的精神生活及其产品的总称，其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系统。不仅包括与文化部门有关的音乐、歌曲、舞蹈、美术、杂技等艺术表现形式或作品，以及一些复杂的民族或区域生活习俗，还深入到包括政治、宗教、经济、医疗卫生、科技、商业、军事、工业、农业、环

<sup>①</sup>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中文版），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页。

<sup>②</sup> [美] 塞缪尔·亨廷顿：《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中文版），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306页。

保、体育、旅游、航天、法律、企业、校园和语言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此外，文化是国家、民族的物质、精神的沉淀与积累，与社会政治、经济密切相融。进步和先进的文化必然是民众参与和能共同分享的精神和物质财富。

另一方面，文化凝聚着社会进化的成就和经验，文化的发展深刻地蕴涵在国家与民族的发展之中。文化是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现实的反映，即一定的社会现实促成一定的文化；同时，文化伴随经济、政治的变化而变化。作为历史上的文化，其中一部分因素作为传统存留于现实，更多的因素则因经济、政治条件的改变而被逐渐淘汰。即使是作为传统予以存留的因素，也非原封不动地保持，而是经过历史的改造，以能适应变化了的社会条件的形式而存留并发挥作用；而现存文化之大部分，则是呈现出时代特征的新元素。

现代社会，文化在推动经济繁荣、营造政治民主、协调社会关系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更成为衡量社会进步与文明发展的重要尺度。具体来看，文化对社会领域的重要功能体现于以下方面：

第一，文化具有教化功能。所谓文化的教化功能，是指通过文化形式、运用文化手段，去教育人、改造人，使他们成为适应社会发展需要的人。历经世代积累，文化成为外在于人而又使人生活于其中的特定环境；整个人类的进化，就是一个不断获取文化，将外在文化转化为自身内在需要的过程。

第二，文化具有控制功能。区别于一般的生物，人的行为具有目的性，人要朝向一定的目标而开展生活；人们生活的总目标由文化价值观所直接决定，因而文化对人们的行为与生活具有不可忽视的导向作用。除此之外，文化的控制功能还表现在对人们行为的规范作用上。存在于社会中的不同个体，持有彼此相异的欲望，这便极易导致摩擦与冲突的出现。正是文化中的制度、习俗与精神，从不同侧面为人们提供准则，我们的整个社会才能够基本保持一定的秩序性从而持续地向前发展。

第三，文化具有调节功能。在社会生活中，人与自然、人与社

会、人与人以及人自身的情感和理智之间的矛盾都现实或潜在地存在着。一方面，社会管理者除运用法律武器进行矛盾调节外，还充分挖掘文化中的理想、道德成分，提升社会成员改善人际关系、营造和谐氛围的自觉意识；另一方面，在调节个人精神状态上，文化则不断提供着各种形式的缓冲方式，以转移、替代或陶醉生活中的痛楚。

第四，文化具有凝聚功能。凡生活在同一民族中的成员，无不受到民族文化的浸染与熏陶，从而拥有共同的民族文化心理特征<sup>①</sup>。这种精神的慰藉和心灵的共鸣，能够最大限度地聚合民众，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并应用于本民族的自强与发展之中，激发和释放出巨大的进取力量。

### 三、传统文化板结中国社会

中国是人类文明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历史源远流长。从历史传承至今的中国文化，不仅为中华民族所引以为豪，更对世界文明的进步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

#### （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为文化烙上不可泯灭的印痕

中国传统文化，其形成和发展所主要依托的传统社会，即指从周秦统一中华到1911年辛亥革命之前的封建宗法社会，其学说体系的构成则是以四书五经等文本形式存在的儒学为主体，儒、释、道三家理论彼此互补。依托于传统社会的传统文化，在当时扮演着主导意识形态与统治思想工具的重要角色，“不仅是哲学、政治、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文学艺术、社会心理以及民风民俗等进行了相当强劲、持久的渗透”<sup>②</sup>。

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包涵独具特色的语言文字、浩如烟海的文化典籍、嘉惠世界的科技工艺、精彩纷呈的文学艺术、饱含智慧的哲学宗教以及完备深刻的道德伦理。探寻这一系列丰富的文化因素

<sup>①</sup> 叶志坚：“文化功能论”，《中共福建省委党校学报》，2003年10月，第34页。

<sup>②</sup> 刘东超：“论儒学的当代性问题”，《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第79~84页。

的形成过程，当时社会的特征为其烙上了明显的印痕。

从经济方面看，全球数千年的文明历史中，中国的农耕经济持续的时间最长、最为繁荣、产生的影响也最为深远。一方面，农耕经济的持续性造就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持续性，它伴随着农耕经济的长期延续而源远流长，同时历经动乱与分裂洗礼而不断充实和升华，进而具有日益强劲的承受力与凝聚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农耕经济还具有多元成分结构，因此使得文化显示出兼收并蓄的包容属性。在农耕经济日渐繁荣并向周边扩展的过程中，中国传统文化不断吸纳百家学说、少数民族的文化精华，促使各区域文化相辅相成、交相辉映。

除却经济因素，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还受制于特定的社会政治结构。漫漫的历史长河中，中国拥有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完备而系统的宗法制度，包括嫡子之制、庙数之制、分封制度等，同时，专制制度一脉相承、日渐强化。在宗法制度与专制制度的彼此结合与共同作用下，中国形成了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政治结构。这种结构深刻地影响着文化的发展，使得中国古代的整个文化领域都围绕着政治而展开，“安邦定国”成为古代文人求学、治学的根本目的，群体本位的价值观成为社会的主导价值观。

## （二）具有中国特质的优秀文化成分

经过中华民族生存发展的社会实践的检验和思想家们的概括提炼，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一系列为民众所世代传承的优秀成分。这些优秀的文化传统，固然有世界优秀文明与文化的一般共性，但它终究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环境中所形成和发展的，故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质。

首先，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中心。在宗法传统的全方位渗透下，中国历来高度重视伦常规范和道德教化，从而形成了以“求善”为旨的伦理型文化，与希腊以“求真”为旨的科学型文化各成一派。伦理型的中国文化，伦理是出发点和归结点，齐家、治国、平天下皆以“修身为本”，以致文学突出强调教化功能、史学以“寓褒贬，别善恶”为宗旨、教育以德育统驭智育、人生追求则以“贱利重义”

为价值取向。中国的安身立命观念中，最注重个人自我德性的修养，儒家的自我修养理论尤其影响深远。孔子主变“天下无道”为“天下有道”，“圣”、“贤”、“君子”是理想人格的集中表现，即通过“反省内求”和“经世”在德性修养方面达到仁、智、勇的“三达德”境界。

其次，中国传统文化强调“和合”思想。“和合”思想是中国古代哲学家们对自然界、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和合现象的本质概括。它客观地承认事物的差异性，如阴与阳；同时又将具有差异性的事物有机地合为一体，如阴阳一体、“天人合一”等。“天人合一”强调天道与人道、自然和人为的息息相通，和谐统一，最早体现在《周易》当中，“日月得天而能久照，四时变化而能久成，圣人久于其道而天下化成”《易经·恒卦象辞》。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关系更是“和合”之主要内容。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治国处事皆以“和”为准则；墨子曰：“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互济互补方可社会和、世界和。

再者，中国传统文化重视实践品格。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固然未将实践概念加以明确提出，但众多学家所崇尚的“力行”意识本质上即是实践品格。以儒家为例，儒家人物大都为力行主义者，“力行为重”，反对纯粹求知之可能与必要。“力行近乎仁”是力行观念的最高概括和升华，即“力行”不只是道德修养和道德践履，还包含社会政治实践的意蕴；个人不单要注重自我身心修养，更要立志变革或改革社会。

此外，中国传统文化具有整体思维。中国古代先哲长于用整体视野观察和把握事物，自始至终视任何对象为一整体，在整体观的统驭下感受和分析事物内部的联系和区别并最终揭示其本质。比如哲学中“一是即皆是，一明即皆明”、医学中的经络理论，以及著名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命题，都无一例外地呈现出鲜明的整体思维。

### （三）传统文化的弊端与危害

优秀的文化成分为民族形成和发扬其传统美德奠定了坚实基础。

然而，中国传统文化所赖以生长的毕竟是分散的小农经济、专制的政治体制以及宗法式的社会结构，以这种独特的社会环境为背景，一系列道德规范、纲常伦理，无论在当时还是于现今，都呈现出明显的控制、禁锢、愚民色彩。因此，在当前快速变化、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中，我们必须深入分析传统文化中的消极成分，进而才能采取有效举措加以彻底摒弃。

1. 文化枝叶化现象。作为中国主流文化的儒家显学文化，在历史发展中客观存在着枝叶化现象。在春秋战国之前，中华大地曾经形成过“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格局，思想界异常活跃；自秦统一全国后，焚书坑儒让学士们寒骨，从此，中国封建士大夫的思想自由便屈从于政权的淫威；而到汉朝武帝时，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用“武器的批判”替代了“批判的武器”，其他学说开始处于从属地位，几近消灭，思想界仅剩儒家一棵参天大树；虽经唐、南北朝佛教盛行的冲击，儒家地位始终未曾撼动；再到宋朝，重新阐述儒家思想，把人的日常生活同封建等级思辩地连到了一起；明朝的开国皇帝发明了八股文与文字狱，将文化人的书写模式固定化，同时不允许任何人的思维越线，后期的王阳明，则把人的精神等灵性的东西同儒家结合，发明了意念犯罪，更加禁锢了人们的思想和行为模式。人们的思维从属和服务于农业经济，尽管其中也不乏科学思维的火花，但终难成燎原之势。

2. 盲目的大国优越感。由于中国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以及中国人对自己所处自然环境的初始性感觉的认识，久而久之养成了“中国中心论”，中国文化日益走向封闭与孤立。这种普遍存在于上至统治者下至普通民众的盲目的大国优越状态，不仅封闭了中国人对外开放的视野、紧缩了中国人内心世界的空间，更失去了交流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机会，而文化上的保守心态，同样造成了经济发展缺乏持续动力、政治文明停滞不前。这种大国优越感，正是与“大一统”的政治理想密切相关，社会的权力越集中，社会的进步程度就越高。于是，在“大一统”画地为牢、禁锢民众思想、束缚民族奋起翅膀

的作用之下，当中国人站在世界科学的最高峰时，他们便再也找不到向上攀登的方向了，整个民族的创新思维和创新能力也开始日渐转向低迷。

3. 官本位思想与草民劣根性。中国封建统治中的等级森严，在统一的皇权下，官吏直接掌有统治权力并享有较高的社会地位，所以，官职成为衡量人们身份的标尺，通过读书求功名、走仕途更成为社会公认的“正道”，以官“光宗耀祖封妻荫子”，“官职拜物教”因而源远流长。而居于官之职之后，这些官吏们的“立国安邦”之志便极易在官僚作风之中被消磨，最后甚至滋生腐败并任意“鱼肉”百姓。

与高高在上的官吏相对，“草民”是对生活在社会中下层广大民众的形象概括，他们是微不足道的小角色，不敢追求自己的权利，只是一味被动和顺从。对于草民阶层，我们“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克己复礼”、“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儒家说教，以及“难得糊涂”、“吃亏是福”的道家应世学说，将民众的思想囿于狭小的空间，将民众的激情彻底击毁；而他们自身，则安于现状、乐得稳定，执着于实用的理性而俯首帖耳地辛勤劳作、排斥变革。

4. 无视民主与法制的宗法制。宗法制度根源于农业社会中的家族关系，其中“家长制”是最为集中的表现之一。在家长制下，更多的是武断和专制，毫无民主可言。当家长制把家族中的不平等带到了社会中，家长在家庭中的特权便相应地转化为官吏在社会上的特权。官吏的特权化加之官本位思想的根深蒂固，农业社会的行政架构便坚不可摧，强权与腐败成为社会风气的主流，俗语“千里做官为了吃穿”就是明证。另外，宗法思想极其重视血统，于是特权得以世袭，并通过制度而固化，这样，寻常百姓突破血缘阻力而凭能力出人头地的尝试更可谓徒劳了。更进一步，基于血缘纽带的宗法伦理，只承认人伦关系网的存在，否认个人的独立性与天赋之民主权利；在这种严格的等级制下，整个社会就被分成了命令和服从两个极端。于是，人们在进行行为选择时，总是首先考虑是否符合上司的要求、会

不会使当权者的利益受损，而不管是否符合正义或是法律。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反过来必然导致对民众权利和法律规则的视而不见。

5. 否定竞争的小农平均思想。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平均思想，主张结果均等、否定竞争，其后果即压制进步、保护落后。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的观念与和现代社会主张机会均等、地位平等、公开竞争、优胜劣汰的状况完全相悖，其仍有的部分残余已经在经济、政治领域中呈现出若干消极影响。首先，在利益分配上，以小农眼光去定义平均，只能是见权利而不见义务；而以小农眼光去定义平均看待人民当家作主，只能导致不要任何权威的无政府主义倾向。其次，在责任分配上，小农平均思想易造成责任相互推诿，最终形成无人负责的局面。

### 第三节 大力创新 培育文化产业

伴随人类跨入以知识社会为背景的全球化新时代，世界经济贸易呈现出一系列新特点：世界经济繁荣板块东移，东盟与中国行将成为新的世界经济增长极；世界贸易方式发生巨大变化，贸易主管道流动由实物化发展到电子化；国际经济贸易规则不断创新并趋向柔性化，境外消费、自然人流动以及跨边界交易取代传统的跨国经营成为现代世界经济贸易规则的基础。面对世界经济贸易的新特点，尽管各国的竞争伙伴关系日趋弹性化，但竞争的激烈程度并未降低，尤其聚焦于国家创新力的较量。因此，构建持续不竭的知识动力机制和营造产业高附加值的文化氛围成为全面提升国家创新力水平的关键所在。

#### 一、世界文化产业的发展态势

按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界定，文化产业是指按照工业标准，在生产、储存以及分配文化产品和服务方面的一系列活动。这一界定突出了文化产业的两大属性：一方面，文化产业日渐成为新兴主导产

业；另一方面，文化对其他产业和社会结构的变迁具有加速和倍乘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文化产业作为新兴的朝阳产业，已成为全球发展最快的产业之一，在各国经济中的地位也越来越突出。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近年报告显示，全球文化产业在经济领域的份额正以每年11.3%的速度增长。世界上主要发达国家的文化产业大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0%以上，意大利甚至达到25%。在美国400家最富有公司中，有72家是文化企业，文化产业的出口额大大超过汽车及配件业、飞机制造业、农业等传统产业，成为第一大出口项目。英国的文化产业年产值已达600亿英镑，平均发展速度近两倍于整个经济的增长速度；现有大小出版社10000家以上，书店36000家，年产值达24亿英镑。日本娱乐业的年产值早就超过了汽车工业的年产值，音像产业是国民经济的第二大产业，在国内十大产业中排名第六。加拿大文化产业的产值也超过了诸如农业、通讯及信息技术等行业。澳大利亚文化产业的从业人员比例占全国劳动力市场的10%，文化产业年产值近200亿澳元，约占国民生产总值的2.5%，是澳大利亚第三产业中的支柱产业和主要出口行业。

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各文化产业集团早已打破了行业与地区之间的分工界限，彼此寻求在资金、技术、经营组织方式等方面的重新组合与集中；伴随着跨行业、跨国界的强势文化产业集团将不同行业的分散经营变为一体化、全球化经营，其文化产品便自然会获得国际市场上的垄断地位。当今世界传媒领域由九大巨头<sup>①</sup>把持的状况便是文化产业垄断化的最直接体现。

信息技术的发展和网络的普及，客观上又促成了文化产业与信息产业的紧密结合。自动化、数字化、网络化等高科技融入文化产业，使得文化产业的技术操作日趋简单、提供服务更加全面，不同业务之间的合作与开发空间越来越广阔。

<sup>①</sup> 当今世界传媒领域的九大巨头是指：美国在线—华纳公司、迪斯尼公司、贝塔斯曼公司、维亚康姆公司、新闻集团、索尼公司、通信公司、环球公司和日本广播公司。

但是，鉴于各国经济实力所决定的科技实力、经营经验等方面差距的存在，各国文化产业的发展速度呈现出天壤之别，形成了区域间文化市场的发展不平衡局面，进而加剧了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

## 二、中国文化产业存在的问题

中国拥有五千年辉煌的传统文化优势，当前的 13 亿人口又为文化产品提供了无限广阔的市场。于是，尽管文化产业的起步较晚，却在短时间内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文化产品数量迅速增长，文化产业初具规模、门类齐全。传统意义上的文化产业行业，如新闻出版、广电和文化艺术等，其从业人员已达 223 万人，实现增加值 884 亿元；新兴文化产业行业，如网络文化、休闲娱乐、文化旅游、广告及会展等，其从业人员达 422 万人，实现增加值 835 亿元，创造价值接近传统的主导产业；而直接从事文化用品、设备及相关文化产品生产与销售的人员达 629 万人，实现增加值 1858 亿元。

置于国际文化产业发展的浪潮之中，中国文化产业的总体发展势头依然迅猛；但在横向比较之后，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产业尚处于幼稚阶段，在许多方面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只有对发展过程中存在的现实问题加以全面分析和系统思考，才能提出解决问题的有效对策，进而及时采取措施、扫除文化产业发展的障碍、迅速提升产业竞争实力。

### （一）管理体制不顺，产业发展仍囿于传统思维

改革开放前，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文化产业规模小、发展慢，而文化管理则被完全置于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文化产业的发展束缚重重。伴随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日益完善，改革从经济领域扩展到社会各领域，文化产业管理也面临改革，政府管理文化产业的方式发生重大改变。从“十五”第一年提出“文化产业”，到 2003 年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再到 2005 年试点基本结束，2006 年开局之年，文化体制改革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推开。政府主管部门从主管政

府所属文化机构向主管全社会文化机构转型，文化产业单位（集团）由事业单位向企业转轨，文化市场也逐渐向外资开放。

尽管如此，政府与文化经营单位之间的责、权、利关系并没有完全清晰，政府对具体的文化经营单位仍然管得过多、过死。因此，文化产业经营者的自主性与创新性仍然被严重束缚，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活力不足。同时，市场配置资源的作用难以充分发挥，文化产品供给与需求之间、文化产业消费者与经营者之间的矛盾无法避免。这些都成为制约中国文化产业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另外，现行的文化产业管理体制致使各类文化产业部门分割、各自为政，即电影、广播影视、报刊、出版、音像、娱乐和广告七大门类分别由广播电影电视、新闻出版、文化、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进行监管，遵循反映不同部门特点的文化产业政策，既不易于形成产业规模优势，更不利于形成较强的国际竞争能力。

作为经济全球化的一个直接后果，“文化全球化”成为资本争夺的一种新形态。它不仅要求各国应有选择、有步骤、积极、适度地引进国际文化金融资本和输入文化商品，以满足国内文化产业发展和结构调整以及日益增长的人民文化消费的需要，更要求各国树立平等的文化视野，以开阔的文化胸襟使本国的文化产业大胆而谨慎地走出去，尽可能地扩大文化商品的出口，从国际资本、技术和文化市场上获得文化产业持续发展所需的资金、技术和市场份额。然而，中国长期以来却为意识形态所囿，在对外交往中一直没有足够重视文化产业的份量，严重地忽视了文化商品的国际贸易所可能带来的巨大商机。

#### （二）投融资渠道单一，产业市场开放程度低

就融投资方面而言，中国长期形成的是“国办模式”，即完全依靠政府力量解决文化产业发展的资金、技术、人力、管理问题，这既增加了政府负担、违反了政府公共管理规则，又无法为文化产业的迅速成长提供强有力支持。中国的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市场广阔，文化产业发展具备良好条件，外国资本、民间资本对文化产业进行投资的愿望颇高。然而，国家对外资和民资进入文化产业领域持有严格限

制，导致实际进入该领域的外资与民资的规模极其有限。从国外文化产业运行实践来看，扩大投资规模、利用高投入激发高产出是一则重要的成功经验，而中国文化产业的发展要想有更大突破，必须改变投融资渠道单一、发展资金不足的现实状况。

另外，中国的文化企业尽管为数较多，但规模普遍偏小，致使生产要素配置过于分散，规模效益低下。因此，当前的迫切任务之一，就是培育具备雄厚的资本、技术和人才实力的大型文化企业集团，引导它们参与激烈的国际文化产业竞争并占据优势，进而由其带动国内文化产业实现飞跃性发展。

### （三）科技含量不高，产业创新意识亟待增强

现代科技是文化产业发展的根本动力。先发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历程一再证明，先进、发达的科技将持续为文化产业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伴随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普及，高科技与文化产品相结合的潮流席卷全球，而当前中国文化产品与服务中的科技含量，与国际水平都存在较大差距，包括舞台技术、印刷技术、图书销售、影视制作等在内的许多领域，甚至仍然停留于传统的工艺水平和制作流程，严重制约着文化产业整体水平的提高。

创新是现代文化的内核和文化产业竞争力之灵魂。文化产业凝结一定程度的知识产权，并传递象征性意义的创新型文化产品与服务，既有利于社会成员的身心修养和素质的全面提升，更易于促进社会共同目标的形成。以精神、价值为生产、扩散、聚合对象的文化产业，还能直接创造国民收入产值，尤其体现了科技与文化的融合，通过不断吸收、运用高科技因素而使得产业本身的创新化水平提升，最终影响整个国家的创新能力和发展动力的积蓄与提升。反映在文化产业发展上，原创能力是衡量文化产业发展的关键性指标。只有原创性的文化产品与服务，才能真正吸引世界之目光，才能带来产业发展所不可或缺的资金与市场，才能拥有持续的生命力。正视现实，中国的文化产业在走向国际化的过程中，鲜有称得上是“创新”并引起世界关注的理论成果和艺术作品问世；各种新的学说、思潮的大量碰撞本应

融合和焕发中国文化原创能力，由于种种原因，反而成为了影响和制约中国文化原创能力的因素。

### 三、推动文化产业发展、提升创新水平

从人类的发展进程看，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知识经济已经以不可阻挡之势渗入到当今世界的各个领域。知识经济追求知识价值的不断创新，知识经济形态使得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日益成为衡量一国在世界竞争中掌握主动权程度的标准、成为影响国家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的核心要素。

创新是文化竞争力的灵魂，是一个直接关系文化经济价值持久发挥的基础。“创新”的内涵涉及到三大方面，即制度、管理与技术。制度创新是把一种新关系、新体制或者新机制引入人类的社会和经济活动中，并推动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过程；管理创新指将一种新思想、新方法、新手段或者新的组织形式引入企业、国家的管理中，并取得相应效果的过程；而技术创新则是把一种新产品、新工艺或新服务引入市场，实现其商业价值的过程。从提升国家创新力的高度推动文化产业发展，应当时刻以创新理念为指导，积极探索文化产业在制度、管理与技术方面的创新发展策略。

#### （一）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策略

技术可以超越，制度无法超越。在催生新思想和孵化新产业的过程中，制度优于技术，机制更为重要。发展文化产业，应当率先落实各项改革措施，建立起有利于文化产业发展的制度。有效的制度安排是激发新思维、推进管理、技术进步的强大动力。

文化产业制度创新的基础是建立健全文化产业的政策法规体系。完备的文化产业政策法规体系应当包括：文化资源占有使用政策、财政税收金融政策、文化产业结构优化政策、文化产业法律和法规等等。以市场方式有效配置文化产业，同时对文化产业进行产权体制改革，明确文化产业的产权归属关系，达到政企分开之目的；“谁投资，谁受益，同时承担风险”，既可以克服文化产业发展资金短缺的

困难、为文化产业的迅速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支持，又能够推动政府尽快转变职能并强化社会各界对文化产业发展的监督。

通过资本市场进行直接或间接的融资，实现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和融资渠道的商业化，主要方式有：引进外资，提升文化产业资源配置的国际化程度；调动民间资金，广开社会投资渠道，充分调动公众对文化产业建设的积极性和参与性，尝试在政策上允许和鼓励集体、家庭和个人以参股、购股、合伙经营等方式申办或参与经营各类中小型文化企业；制定相关税收政策，鼓励个人和团体对文化产业的赞助；发行文化彩票，募集社会资金以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等。

## （二）文化产业管理创新策略

文化产业本身就具有创造经济价值的属性，完全可以由市场对其进行资源的有效配置；而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政府）的职能，主要是通过营造更加规范、有序的文化市场环境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进行有效引导。

通过文化资产经营公司实现对国有文化企业的国有资产营运的有效监督和管理；对于与市场联系紧密的各项文化艺术活动，可将其具体委托给文化产业单位承办，进行市场化运作；坚持文化产业的反垄断。

彻底扭转文化领域的大政府局面，从“包办”型的文化行政管理体制转向“管理与服务”型；同时，行政部门要简化审批程序、减少甚至避免部门间职能交叉与重复管理现象，积极推动建立和健全文化产品维权机构，强化文化产品的维权力度。行政管理部门要认真履行管理与服务的责任，依法行政，包括重点加强文化法规建设和执法监管、文化产业规划制定和宏观调控等，使政府的行政行为成为文化产业发展的先导，引领文化产业发展的方向。政府还要集中开展战略研究，进行顶层设计，制定《国家文化产业发展纲要》，明确文化产业科技发展的方向和目标、优先要解决的关键技术、重点发展的领域以及发展的保障措施等；强化文化产业相关管理部门的创新意识与合作意识，加强文化部门与科技部门的协调、沟通，加快建设文化产

业科技管理信息网络，使其直接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有力的交流与共享平台。

### （三）文化产业技术创新策略

科技水平的差距决定着文化产业在提供产品与服务的数量和质量上的差别。发达国家文化产业的发展之所以动力十足，对科学技术的积极、主动应用是关键所在。以美国为例，20世纪90年代，图书出版公司、音像出版公司就开始把网络技术应用于销售，极大地方便了消费者的选购，从而推动了图书和音像业的飞速发展。反观中国当前的电影业和演出业，在制作、加工、欣赏等许多方面仍然停滞于传统技术的基础之上。达·芬奇曾经说过：“艺术借助科技的翅膀才能高飞”。一个好的文化资源、一个优秀的文化创意要变成文化产品，必须借助于相应的技术手段，文化产品的存储、传播等环节同样要使用相关技术，对文化产业各环节的管理也需要技术的支持。

当前，迅速提升中国文化产业的国际竞争能力、实现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发展，实施高新科技带动战略、为文化产业注入更多的科技含量，是最为有效的手段。国家要适时出台一系列鼓励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的政策，以此激励全社会关注并参与文化科技的研究与开发工作。拓宽文化产业科技创新的范围，一方面，着力对文化产品本身各指标的研究与探索，开发出品质高、创意独特的新型产品，带动文化产业的技术升级和结构重组，形成具有高科技含量的文化产业群；另一方面，还要加强对与文化产业相关的其他领域科学技术的研究，运用相关领域的高科技成果提高文化产品制作、包装、传播等环节的科技含量，使文化产业能够引领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激发人的潜能、适应现代人不断提高的审美品位和心理期待，真正具备过硬的市场竞争力。

大量的实践证明，真正使文化产业发挥应有功效、实现自身价值，提高文化产业市场能力是唯一的途径。中国正处于一个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一个以多元复合社会转型为核心特征的战略机遇期；而文化的创新和文化产业的发展，不仅能够有效增加经济总量、优化经济结构、涵养税源、吸纳就业，更能够通过文化的

熏陶和思想的感召，以理念创新从根本上推动人文精神面貌的更新和社会架构的不断变迁，进而提升国家创新力和竞争力，在发展质量和速度上缩小同先发国家之间的距离。

#### 第四节 文化精进 推动国家全面创新

尽管当前已进入现代社会，但长期的潜移默化使得现在的大多数中国人依然习惯于“唯上”、“唯书”、“唯古”、“唯师”、“唯他”的思维定势，如此状态必然不能适应快速变化、新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环境。因此，中国不仅需要技术的革命、制度的革命，更需要思维的革命、文化的革命。面对社会的全方位转型，中国的文化转型被提升至“精进”进程，文化精进必将迅速推动国家创新、社会进化。

##### 一、生存型文化向发展型文化精进

中国传统文化，是指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以家族为本位、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维护宗法伦理纲常为主要功能的等级文化体系。自给自足、家族本位、血缘维系、宗法至上的一系列特点，都从本质上反映出其“唯求生存”的根本属性，即中国传统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生存型文化。然而，历史发展到今天，中国已经不能再在“与世隔绝”的状态下生存，必须要融入世界发展的总体潮流，面对知识化、全球化的挑战，迅速提升国力、积极参与竞争。而文化，要想在提供精神动力上发挥更大作用，必然快速转型，适应当前形势而催生文化中的发展型成分，使生存型文化向发展型文化精进。

“精进”一词源自《汉书·纪传》：“乃召属县民吏，选精进椽史”，系指精干而有进取心；佛教则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为成佛的基本功之一，称“六度”，能持善乐道不自放逸为精进。在全球普遍变革与本国加速特色转型的背景之下，我们对文化精进的要求就是：传承传统精华与催生现代成分并重；兼收并蓄与保

持民族特色并重；转型速度与转型效果并重。

现代社会所要求的发展型文化，应当包括以下基本元素：

一是开放兼容。文化的开放兼容性是先进文化的固有特征，尤其在当前，信息技术飞速发展使得各国间、各民族间联系日益紧密，社会价值观日渐多元化，中国以儒学传统为基础价值准则的文化也亟待改变。现代文化只有形成积极开放的态势、造就兼容并蓄的机制，才能为保持文化的新陈代谢、增强文化活力供应所需的基本养料，也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文化不断进步。

在内容上，中国文化走向开放兼容，既要向除汉族以外的少数民族文化精华开放兼容，更要对外来民族文化精华开放兼容。在方式上，要“吸收”与“并存”并重。对优秀的异质文化进行吸收，再经“筛选”、“消化”、“改造”，就能形成新的、属于自己的文化内容，从而使自身文化得到丰富与充实；而当几方文化态势相当时，就存在异质文化共存的局面，多元文化就应共存共容、共进共荣，达到“美美与共”的境界。此外，在过程上，实现文化的开放兼容还应当处理好融合与冲突间的关系，在既相互对立、冲突，又相互借鉴、补充中达到综合创新式的融合，才能够使文化的内涵更为博大精深。

二是提倡竞争。当今时代，国际竞争更加激烈、竞争领域日趋扩大，这使得文化既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的核心内容，文化自身发展中对竞争因素强化的要求也更加强烈。

在塑造中国发展型文化的过程中提倡竞争，直接对传统的草民劣根性及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小农平均思想进行彻底批判。广大民众必须改变逆来顺受、甘于不争的消极状态，积极、主动地面对和接受新事物、探索发展的新道路，唯此，中国经济、政治各领域中的改革才能拥有坚实的群众基础、才能够顺利地得以推进。另外，除了着眼于文化发展内涵的内部充实，中国文化也应积极参与国际竞争，改变传统封闭状态下片面的“中华文化中心论”的观点，一方面吸纳世界文化之优秀成分，另一方面，引导中国文化走出去，以文化先行，广泛传播中国文明，重塑中华崛起之新形象。

三是鼓励创新。中国近 200 年的屈辱史，根本上源于观念上的落后，观念落后必定导致经济落后，而要想超前发展，第一就要树立创新思维、形成鼓励创新的文化氛围。

反观中国的传统文化，尽管其中也不乏创新成分，但总体上仍表现为阻碍创新的成分居多，尤其集中于儒家学说中的中庸价值取向。重秩序轻变革——过分注重现存秩序的稳定而害怕革命和变革，习惯安于守成、不图进取；权威崇拜——“长幼有序、尊卑有别”的森严等级，将民众造就为唯权行事、缺乏自我的精神奴隶，创新意识与创新精神的极度匮乏；官本位思想严重——“学而优则仕”，人们的心思成日花费于例行的行政事务而非蕴含众多创新成分的科技事业。因此，在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今天，鼓励创新必须成为中国文化转型中的重要任务。国家要集制度、资源等各方面因素创造有利于激发国民创新的良好环境，在博采众长、广泛汲取世界文明成果的基础上进行文化创新，以文化创新促社会进化、国家创新。

四是以制度为准则，兼顾道德规劝与感召。中国儒家将血缘亲情、家庭伦理纳入其思想体系，形成了集哲学、政治、法律、道德等于己于人一体的宗法礼教，而道德在其中居支配地位，形成中国传统文化的道德中心倾向。然而，道德的规范效应毕竟有限，而且具有明显的人为色彩，尤其在崇尚利益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良好的社会秩序必须靠更加有力的法律、制度手段予以保障。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以制度为准则，因而现代文化也必须强化制度的规范作用。

当然，道德中心倾向塑造了中国礼仪之邦的形象，并使得中华民族极具道德意识，这为减少社会动荡、形成和谐氛围做出了积极贡献。因此，今天在建设法治文化的同时也应当发挥道德文化的优势，为民主政治的健康发展提供肥腴的土壤。

五是保持民族特色。任何文化及其表征都有赖于特定的时空坐标。在时间上，文化总是表现为时代性的转换；在空间上，文化则表现为民族性的差异。时代性是一个文化系统在时间演进中表现出来的维度转换，它体现着不同文化系统之间的可通约性；而民族性则是一

个民族的文化系统所特有的无法被异族文化所替代的独特规定，它造成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不可通约性<sup>①</sup>。文化转型要改革和丰富已有文化，文化转型更要保持民族特色，继承和发扬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几千年沉淀，一系列优秀成分已经深深地融于人们的潜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内化为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文化品格。如刚毅奋进、互帮互助、克己奉公的精神；自强不息的人生信念；“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道德情操；“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等。这些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文化成分，非但是中国民族的标志和象征，更对世界文明的进化具有积极意义。因此，在现代文化体系构筑之中，各民族都有义务发扬和传承本民族优秀的特色文化成分，为全世界民众所共享。

## 二、文化精进促进国家创新

创新，是地球生命圈中人类作为万物之灵的最高能级的生命活力和创造能力，是一个民族不断进步和繁荣昌盛的灵魂和源泉。创新，无论作为一种理念还是一种行动，都毫无疑问地成为全世界最为热门的社会话题，成为决定各国未来国际地位的关键性因素。鉴于此，世界各国相继展开新一轮的以提升创新能力为核心内容的国力较量，尤其聚焦于以科学技术、人力资本和文化价值为核心内容的“软国力”的较量，加速实施创新型国家建设。

实现建设创新型国家的目标，不仅有赖于社会物质资源的保障，更需要文化精神的支撑。因为，“观念的创新、科技的创新、体制的创新都要回归于文化的创新，这不仅是逻辑的必然，也是历史的必然”<sup>②</sup>。建设创新型国家关键在于培育、发展和繁荣民族文化，为创新型国家建设营造一个宽松和谐、健康向上的文化氛围，为创新活动搭建一个崇尚探索、宽容失败的文化平台，从而为建设创新型国家、

<sup>①</sup> 饶涛、饶异：“论当代中国文化转型的运行机制”，《宁夏社会科学》，2002年第5期，第121页。

<sup>②</sup> 徐冠华：“大力构建有利于创新的文化环境”，《中国软科学》，2001年第3期。

决胜创新时代奠定坚实的基础。

以发展型文化为转型目标、以促进国家创新为最终目的的中国文化精进进程，将从以下几方面着力推进：

第一，以“以人为本”为价值取向。人是最宝贵的资源，是最积极最活跃的因素。建设创新型国家，必须充分发挥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树立人才观念，走人才强国之路。也正因为此，当今的国际竞争最终都落脚于人才的竞争。在文化精进的进程中，首当其冲，要改变以往重物轻人的倾向，坚持以人为本。尊重人的个性发展，尊重人的探索精神，保护人的首创动力，尊重劳动、知识与创造；深化科技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将人的创新激情和活力从形形色色的人和物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最大限度地激发人的智慧和潜力，达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

第二，以“改革开放”为精进途径。现代社会的发展型文化是开放兼容的，需要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通过信息、能量的交换得以形成；产品、技术、机制的创新以发展型文化为基础，同样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中得以孕育和成长。只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不断消除僵化、落后、保守的思想积弊，树立积极开拓、锐意进取的创新意识和创新精神；只有深化改革开放，才能不断解除阻碍创新的体制与机制束缚，为创新人才的成长与创新活动的开展发挥提供平台与保障。

第三，以文化创新统领国家创新。文化精进的内涵丰富，文化由传统的生存型走向现代的发展型，能够为国家创新营造良好的环境，同时，现代的发展型文化本身也需要引入创新成分，创新型文化是创新型国家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

创新文化是与创新活动相关的文化形态，是社会成员的创新能力和习惯的表现。创新文化表现在社会共有的关于创新的一般观念和有关的制度设置这两个层面上。其中，价值观念是创新文化的核心，制度是创新文化的保证。广泛地树立创新观念，集中表现在以诚实、求真、公正、严谨的科学精神推动科学研究发展，以崇尚竞争、追求卓越、大胆革新、积极进取的企业精神推动市场经济繁荣。创新制度的

核心在于激励和调动个人的创新能力，创新制度包括科技共同体内部的评价、荣誉、奖励、竞争、成果共享等规则，以及社会对于创新活动的保护、管理和协调机制，比如知识产权制度、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机制等。

### 三、文化精进与社会进化

在对历史和现实进行探究后，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工业国家对世界市场的控制以及后发国家自身底子薄、市场不健全、基础设施不完善、机会和资金缺乏等传统因素，都不足以说明社会不发展的根本原因。他们把目光投向文化领域，认为文化的嬗变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基因。

应当说，文化决定发展的结论，人文学者可能举双手赞同，但经济学家和人类学家恐怕未必会以为然。的确，文化究竟能在什么程度上影响经济、政治与社会其他领域的发展，这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探讨的问题，但文化对社会的重要影响作用不容置疑。至少，文化精进是有利于社会进化的。

首先，文化精进适应经济变革。文化的精进以人的观念更新为载体，人们市场中主体意识的觉醒，对经济向市场深入变革意义重大。因为，市场经济的基本理念便是独立、平等与竞争，基于自由、创新文化氛围，经济主体个人的积极性和创造力可以最大限度地得以激发，进而以实现高效率为目标推动市场繁荣与经济腾飞，完成经济的全面市场化转型。

其次，文化精进营造政治稳定。现代社会的政治稳定，包含稳固的政权性质、合理的权力机构及有序的政治过程等若干范畴。政治稳定是一种动态的稳定、发展的稳定，因而有赖于文化精进为其赋予新的内容和持续活力。在文化精进过程中，“民主”、“法制”的旗帜愈加鲜明，即民主决策、民主参与将为政治清明、参事自由等创造最宽松环境，同时，现代法制与传统道德的共同约束，更有利于从根本上规范人们的各种行为、保持良好的社会秩序。

再者，文化精进促进国际交流。在全球化的当代社会，整个世界都被纳入到与其他国家的相互交往与交流中，而各国的文化价值观之间也无法避免地产生碰撞。一方面，本国文化有保持自身特色的自由；另一方面，它更可以在文化的碰撞中“取人所长、为我所用”。于是，文化本身日益走向开放，而这种意识上的深层开放必然反过来促进国家间的全方位交流，包括生产、贸易、投资、教育、娱乐等等。

重视文化精进于中国社会进化之意义，在当前形势下更加必要和迫切，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拉美现象谈起。“二战”后的拉美，曾经因遵循依附理论而迅速崛起，并一度被美欧树为发展中国家“通向经济发达、政治民主”的优秀典型。然而伴随信息化、知识化等新时代特征的日渐突出，拉美社会发展的后劲明显不足，一系列发展中的城市问题、市场问题、环境问题开始显现，因此哈里森通过比较研究得出，拉美的不振源于其依然流连于跟不上时代的静态文化价值观念中。

哈里森认为，当前时代需要动态文化，主张未来与进取的时间观念取向；以工作与成就为幸福生活的核心；强调节俭与投资；视教育为发展的关键；强调个人能力；文化中社会认同与信任的辐射半径超越家庭界限而进入社会；伦理道德代码严格而清廉；文化权威分散、平行，鼓励不同意见；宗教对公民生活的影响较小。对于中国的文化发展以及社会进化来说，孕育文化价值观的上述“动态”特征，使之向明显的、更具竞争力的“动态”模式发展，似乎也是当务之急。

总之，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经济的综合反映，同时，又反过来对一定的政治、经济产生巨大影响，从而促进或延缓一定社会的发展。中国当前倡导和实施文化精进，必将发挥传统文化优势并引入现代发展与动态因素，更进一步提升民族认同感、重构科学的社会行为标准以及加固国家发展之精神支持。